

WOGUO YANHAI WAIMAO
JIAGONG JIQUN DE
QUDIFANGHUA WENTI

我国沿海外贸加工 集群的去地方化问题

朱华友 等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我国沿海外贸加工 集群的去地方化问题

朱华友 等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国沿海外贸加工集群的去地方化问题/朱华友等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 - 7 - 5141 - 6217 - 2

I. ①我… II. ①朱… III. ①沿海经济 - 对外贸易 -
加工贸易 - 企业发展 - 研究 - 中国 IV. ①F752. 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0505 号

责任编辑: 李 雪
责任校对: 王肖楠
责任印制: 邱 天

我国沿海外贸加工集群的去地方化问题

朱华友 等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010 -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010 - 88191522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天猫网店: 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 [http: //jjkxcbs. tmall. com](http://jjkxcbs.tmall.com)

固安华明印业有限公司印装

710 × 1000 16 开 20 印张 300000 字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6217 - 2 定价: 62.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 8819150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88191586)

电子邮箱: [dbts@ esp. com. cn](mailto:dbts@esp.com.cn))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41171106）

WOGUO YANHAI WAIMAO
JIAGONG JIQUN DE
QUDIFANGHUA WENTI

代序

产业集群研究的延伸——去地方化研究

王缉慈

今天收到华友的来信，附件是一篇书稿。信中写道：“经过连续数月的奋斗，书稿大致写好了，准备交到出版社。您看看有什么修改和建议。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书稿上能不能署您的名字”。关于文章或书稿的署名，我向来是慎重的，何况是这样长篇的书稿。于是，我主动提出，我为这本书写篇序言。

五年前，我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刚结题不久，就从北大的教学科研岗位上退休了。当时退而不休，还想干点事，我和华友合作申请了“我国沿海外贸加工集群的去地方化问题研究”这个项目并获得批准。华友非常努力，在项目进行四年的过程中，勤奋钻研文献资料，并带领团队深入实地调研，在用去地方化的理论研究产业转移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我则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懒，不仅不愿写学术论文，连调研也参加得少了。

任何研究总是承上启下的，对去地方化的研究是对地方化研究的延伸和继续。研究的背景很重要。我想通过我的研究经历，强调地方化的重要性及为什么要研究地方化和去地方化。

20世纪80年代末我学习了西方的增长极文献，最近20年我又跟踪了西方关于产业集群的研究。很多文献强调了发达国家建立在先进技术基础上的创新集群对增强国家竞争优势的经验。相关产业的空间集聚可以为集群中的企业带来集体的竞争优势，不仅在于成本节约，更重要的是形成促进和维持集群创新能力的地方化的产业氛围。

我国沿海外贸加工集群的去地方化问题

早在 1937 年, 美国区域经济学者胡佛把导致地方产业集聚的外部规模经济分解为地方化经济 (localization economy) 和城市化经济 (urbanization economy) (Hoover, 1937)。关于城市化经济和地方化经济, 记得外国教授的讲座中解释十分清楚 (记不得教授的名字了):

There are two types of economies that are considered large-scale and ex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 loc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economies. As the output of firm A increases, the cost of firm B decreases. Positive spillover will cause firms to cluster in cities.

- *Localization Economies: Industry Level*

Firms share input suppliers

Firms share a common labor pool

Knowledge spillovers

- *Urbanization Economies: City Level*

firms share banks, lawyers, etc...

Job information is spread through informal channels

Easy job search process

多年来, 我在教学和研究中对地方化给予了持续的关注。1994 年出版的《现代工业地理学》教材在集聚经济一节分述了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地方化经济指一种工业或一组密切相关的工业由于集聚在一个地区, 通过功能联系所获得的外部经济; 城市化经济指一种工业由于位于某个城市或工业综合体内部, 通过非功能的空间联系所获得的外部经济。在增长极一节中, 我引用柯拉基奥 1974 年的观点, 一旦采取了增长极战略, 需要保证推动性工业的地方化, 防止它变成飞地, 而飞地型的增长极是不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在区域发展新理论的章节, 我借用波特的论述, 一国的竞争力取决于产业创新与升级的能力, 竞争优势是通过一个高度地方化的过程而产生并持续发展的。在

另外一节则提到企业家能力是一种地方现象，它不易很快地从一地传递到另一地。地方的企业家密度取决于该地的经济结构和社会价值系统。

20年前我看的英文文献大多研究发达国家创新型区域的地方化经济。基于国外文献，在1993年出版的《新的产业空间——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与布局》中，我研究了科学园的理论基础，提到科学园的地方化经济。原有的研发活动可以通过地方化经济，例如共享专业劳动力、设施和专门知识等，诱发新的研发活动和繁衍研发子公司。如果大学鼓励它的教员和研究机构与科学园企业合作，将有效地提供地方化经济以吸引新的研发活动，出现子公司的繁衍。

1996年我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新产业区理论在中国的应用研究”，在2001年出版的《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中，我们从马歇尔产业区到意大利产业区讨论了地方化对创新性区域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作用。在产业区研究中，我注意到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M. Granovetter）1985年提出的经济社会学概念——嵌入性或根植性（embeddedness）的含义，即经济行为深深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这个概念转到区域研究，则认为创新环境是基于行为主体互动合作的地方联系的社区，由此，嵌入国土的地方创新系统非常重要。

我所参加的国际地理联合会（IGU）工业空间组织委员会以及后来的经济空间动态委员会在历年年会对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关系不断地进行着讨论。经过多年的学习和思考，我发现关于地方化有两对概念是需要仔细钻研的：一是全球化与地方化；二是城市化与地方化。

先说第一对概念——全球化和地方化。地方化的创新过程正在受到全球化的挑战，地方创新过程被卷入到全球生产的大背景下。一些区域成为某个产业的创新中心，聚集了大量相关技术的研发机构和企业，掌握核心技术和产品生产，把握着产业的发展趋势和走向；另一些区域则成为生产和加工制造的基地，其技术创新依赖创新中心的扩散。全球范围内的联系加强使得知识交流不再局限于本地，尽管知识

我国沿海外贸加工集群的去地方化问题

创新与学习相当大程度上依然是地方化的过程，现代化通信手段并不能取代大量面对面的交流，但是一部分技术知识可以固化在生产设备中，或通过标准化生产、标准化流程管理，克服地理距离给知识交流造成的障碍。一些活跃于不同区域之间的企业家、技术专家成为传递知识和创新的载体，外来的知识和信息成为本地知识创新和学习的重要源泉。

一方面，生产活动全球化也会导致专业化、加强专业化，促进相关产业的分工与合作。发达国家相关企业集聚所形成的地方化的产业氛围是其他区域难以模仿的。从经济学、社会学、创新学等理论上说，产业集聚可以带来外部经济，企业相互靠近的长期交往，可以积累社会资本，降低交易费用；可以促进专业知识的传播，尤其是隐含经验类知识的交流，促进学科交叉和产业融合，使新产业和新产品不断出现。集群内部的自主创新活力是区域发展最根本的内在动力，这种创新活力来源于地方社会文化中蕴涵的企业家精神，以及有利于地方创新主体竞争与合作的制度和结构。知识创新与知识学习都是地方化的过程。尽管经济全球化，但是地方化的因素会使创新型区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凸显出来。

另一方面，在海外布局上，跨国公司子公司与原供应网络内的配套企业常会投资到同一城镇，形成大规模的专业化制造中心。当生产要素向从事某种特定活动的最佳国家的最佳地点迁移时，流动就可能引起专业化。发展中国家的两难困境是，那些产生地方集聚的全球联系并不总是和地方社会经济环境相吻合。当全球化成为逐渐转换大多数的财产的过程，很多本土创造出来的能力被其他地方利用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企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他们不能再依靠降低成本获得竞争力。跨国公司提供了与全球经济的重要联系，掌握着与东道国及其区域讨价还价的权力。它们具备在地方中所没有的知识并可能促进渐进的技术创新，然而这种渐进创新不能充分保证集群竞争力，由此需要通过嵌入性的地方化来发展核心创新能力。

虽然落后地区通过与国际市场接轨，可以快速提升本地技术水平，实现技术上的跨越式发展，这是全球化给落后地区发展带来的后发优势。然而大量知识被固化在生产设备和标准化的操作流程中，降低了对生产操作者个人技能水平的要求。落后地区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管理流程并不必然能够获得相关的核心技术知识，反而助长对先进地区市场和技术创新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使得落后地区缺少自主的创新能力，发展受制于人，并且易受到外部市场波动的强烈冲击。

当关注到沿海的外贸加工集群这样一类集群时，我经常思考几个问题。这些集群的起源主要靠地方力还是全球力？产业联系的主要维度是地方的还是非地方的？发展的技术背景是柔性专业化还是大批量生产？集群中的行为主体是本国创新型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还是跨国公司和全球采购商？我发现，这些集群往往是发达国家跨国生产重组的产物，全球性的贸易商和品牌商往往在这些集群中起潜在的主导作用，这与发达国家以本地创新型企业为核心的、由邻近相关企业互动合作，通过地方化促进技术创新的集群有着本质的区别。

国际上公认的一些集群理论认为，集群能够产生外部经济效应，促进相互学习和技术创新。然而发展中国家的大量集群案例说明，近距离的产业联系并不能保证技术创新。企业之间往往只有少量合作，甚至恶性竞争。在沿海地区，很多集群是外包生产和外商采购的基地，甚至集群内产业联系也表现得不是很明显。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有可能陷入“逐底竞争”的困境，甚至衰退或区位转移。

我在2010年《超越集群——中国产业集群的理论探索》一书中提到，产业转移，从产业集群的角度上说，是企业离开集群（“去地方化” de-localization）而到另外一个地方再造集群或再融入产业集群的过程（“再地方化” re-localization）。对于那些欠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外部竞争压力会迫使集群中的企业做出空间策略上的调整。在该页的脚注中，我注明了“地方化（localization）在这里是专有学术概念，意指在地方上同类或类似活动相互联系。”最近几年来，随着外

我国沿海外贸加工集群的去地方化问题

资贸易商和品牌商订单的转移,出现了企业离开集群而到另外一个地方再造集群,或再融入集群的产业转移趋势。一些俘获型供应商难以摆脱全球贸易商的控制;另外有创新性企业也不得不离开集群的原有供应链而在企业内部全程控制供应链,向批量定制的技术范式升级。

我们在项目设计书中提出,集群的去地方化包括:(1)空间过程,即集群企业从一个地方(去集群)移到另一个地方(再造集群)。(2)功能整合过程,即集群在本地供应链的分离与再组合。

制造业或生产的去地方化(delocal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delocalization of production)研究起源于欧美国家的学术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也对去地方化进行了系统的探讨,2007年在波兰的克拉科夫举行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去地方化”国际会议,我的朋友 Garry Geriffi 和 John Pickles 等教授都出席了会议。很巧,正当我们准备申请此研究项目时,2011年第二期的国际一级学术刊物《区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以专刊形式强调了去地方化对欧洲多个行业的影响,说明了去地方化研究的重要性。近些年西方的演化经济地理学等学科仍然在持续研究这类现象,文献还在逐年增多。

在去地方化和再地方化成为可能的条件下,企业以何种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和生产网络,如何通过去地方化和再地方化在地方集群中升级是亟须回答的理论难题,其中,认识地方企业与全球企业的不平等权力关系是问题的关键。一方面,在去地方化可能的条件下,掌控关键资源的全球领先企业为获取更多的垄断租,可以进一步挤压低成本供应商,使得集群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更趋于边缘化。另一方面,集群企业可以通过去地方化和再地方化脱离全球价值链的权力结构形成自己的生产网络体系,进而实现原有经营活动的升级。因此,研究外贸加工集群的去地方化问题可以从理论高度深刻揭示发展中国家被动形成的外贸加工集群的实质;从去地方化和再地方化的视角对产业转移进行研究,有助于揭示低附加值的制造业环节在国内外不断迁徙的现象本质,以及如何升级的路径。

对于发展中国家以承接大批量生产为特征的低端集群来说，企业生产技术范式的变化却可能引起企业去地方化。这一点是我在东莞鞋业集群的调研中发现的。2011年我在《北大商业评论》第4期发表了“让低端产业集群‘飞’”一文，以东莞鞋业集群为例论述了去地方化问题。一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采取了比较高级的生产方式，如批量定制，在集群内难以寻找配套企业，于是跳出低端集群，建立一体化集团。在集群内其他企业转移到外地时，少数创新型企业采取了批量定制的技术范式，与集群内和行业内供应商生产的批量不匹配，不得不打造本企业内的供应链，向一体化企业发展。发展创新集群，通过地方化外部经济促进成本降低和通过知识溢出促进技术创新仍然是区域发展的需求，那么，低端集群中习惯于为大批量生产提供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企业如何随之变革，就可能是使集群转型与升级，从而回归地方化的问题之一。

由此，可以从集群内创新型企业的技术范式升级——从大批量生产廉价标准化产品到批量定制时尚高利润产品的角度出发，分析集群区域内相关企业的灵活应对，由此带来低端集群整体向以柔性生产系统为特征的高端集群的升级。在当前电子商务发展迅速的时期更需要关注这个趋势，这关系到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以及合作机构、教育培训机构、技术创新平台的运作，这些问题还有待于深入探讨。

研究去地方化，揭示外贸加工集群的实质和升级障碍的目的，说到底，还是一个如何通过再地方化进行产业升级问题。对于产业转出地，如何发展创新性的地方化经济，也就是知识溢出和技术创新，形成独一无二的国际竞争力；对于承接产业转移的地方，则是如何发展地方化经济，促进产供销联系和产学研合作，以及通过制度创新来实现产业升级的愿景。这些都是长期的动态的发展过程，需要在全局视角下，以技术—组织—区域三位一体的思维构架进行持续的观察和研究。

应重视嵌入地方化的社会网络的力量，而不是把所有赌注下到一

些不植入国土的大公司之上。地方集群里的大部分个体企业的力量很小,集体效率很重要。尽管当大量的地方企业是跨国公司的合伙或承包商的时候,在地方行为主体之中建立正式合作关系相当困难,但小企业仍然仰赖其无形的不稳定的地方社会网络,它能强烈地影响地方企业的行为。外部干预可能破坏或强化这种无形网络。政府和行会的作用,就是通过各种合作机构和组织各种集体活动来强化嵌入地方化的社会网络,在地方企业中进行合作行动,提高集体效率。

关于上述的第二对概念——城市化和地方化,这两个概念在我国迄今为止还是混为一谈。中国的产业发展和土地开发问题一直缠绕在一起。深圳、浦东、天津滨海等大小新城和新区开发的成功,激发了很多行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设立和建设开发区的热情。园区和新城的名称不断变换,工业园区、高新区、生态产业园区、低碳园区、创意文化产业园区、经济城、科技城……一些省纷纷出台政策,支持产业集聚区的建设,甚至订出了每亩项目投资强度和年营业收入、产业协作配套能力、相关企业数目等具体的衡量指标。现在,对产业集聚、产业集群、创新集群等名词,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都已经耳熟能详,园区和新城一次次名称的变化,发展理念是否有实质性的变化?是否真正转移到依靠技术创新的理念上来?园区中是否能发展地方化经济,尤其是促进知识溢出的地方化经济?

我在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学术会议所撰写的英文论文 *Industrial clusters in China: the low road vs. the high road in cluster development* (2007 年发表) 中,对集群研究中关于城市化与地方化混淆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文章节选如下:

Loc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economies

The first major source of ambiguity confusion over the concept of clusters is the confusion of loc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economies. According to Hoover (1937, 1948), the benefits of agglomeration can be grouped together into three categories: internal returns to scale, localization economies and

urbanization economies (Gordon and McCann, 2000). Internal returns to scale result from larger groupings of firms and industries being concentrated in one location. Urbanization economies result from concentrations of popul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a common labor pool, and shared quality of life. These externalities accrue to all local firms, irrespective of sector. Localization effects, in contrast, stem from the agglomeration of specific activities which favor specialized infrastructure and human capital, including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political lobbies. This type of agglomeration economy is confined to a group of local firms in a given sector (Gordon and McCann, 2000).

Scott and Storper (2003) state three basic factor underlying agglomeration in their analysis of agglomeration processes. Their statements obviously draw a clear connec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economies:

“Cities always appear as privileged sites for economic growth because they economize on capital-intensive infrastructure (which is particularly scarce in developing areas), thus permitting significant economies of scale to be reaped at selected locations. But to this obvious basic factor underlying agglomeration, we must add three further sets of phenomena that complement and intensify its effects, namely (a) the dynamics of backward and forward inter-linkage of firms in industrial systems, (b) the formation of dense local labor markets around multiple workplaces, and (c) the emergence of localized relational assets promoting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effects. Some brief commentary on these points is now in order.”

Storper and Venables (2002) use the term “buzz” to identify an important sub-set of urbanization economies, which refers to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benefits that result from face-to-face contacts, and the co-location of people and firms within the same industry and place or region

(Bathelt, Malmberg and Maskell, 2002).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owever, the concept of a sector-specific cluster is largely confused with a pan-sector agglomeration of firms—a concept related more to Hoover's theories about urbanization.

在我国，集群和园区的概念一直缠绕在一起，城市化和地方化这两个概念也一直缠绕在一起。是否一定要通过造城来发展产业，以及产城是否能够融合，企业如何在近距离邻近和共生，如何发生促进降低成本和技术创新的效应，这些问题至今仍是谜。

近几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出台法规条例，包括采取地区差别对待的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规划和建设产业转移工业园区，意在鼓励产业有序转移，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不过，产业转移本质上是企业的市场决策行为。如果对于产业转移的干预“越俎代庖”，强制某类企业迁移，会直接造成本地工人失业，突然释放大量土地，由于代替产业难以一时到位，产生“空心化”后果，还会破坏本地的商业氛围，很难将高附加值的企业真正留住。

无论如何，增强区域竞争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个大方向。当前，产业转移正在进行着，中国的产业空间动态变化十分迅速，地方化—去地方化—再地方化的形态多变，其内涵和趋势令人捉摸不透，研究无止境。长江后浪推前浪。希望华友和他的团队接过这个接力棒继续跑下去，也希望更多的学者关注和进入这个研究领域。

参 考 文 献

1. Bathelt H. , Malmberg A. and Maskell P. 2004. Clusters and knowledge; local buzz, global pipelines and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creation. I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Vol. 28) pp. 31 – 56.
2. Dicken P. 1994. Global – Local Tensions; Firms and States in the Global Space – Economy. *Economic Geography*. Vol. 70, Issue 2, pp. 101 – 128.
3. Ernst D. , Kim L. 2002.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knowledge diffusion, and local capability formation, *Research Policy*, 31 (8 – 9) ; pp. 1417 – 1429.
4. Gereffi G. 2006. The new offshoring of jobs and global development. *ILO Social Policy Lectures*. Geneva. ILO.
5. Gordon, I. and P. McCann 2000. “Industrial Cluster; Complex, Agglomeration and/or Social Network?” *Urban Studies* 37 (3) ; pp. 513 – 532.
6. Humphrey J. , Schmitz H. 2002. How Does Inser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ffect Upgrading in Industrial Clusters? *Regional Studies*, 36 (9) : 1017 – 1027.
7. Hammami R. 2008. The Relevant Features of Supply Chain Design in the Delocalization Contex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Volume 113, Issue 2, pp. 641 – 656.
8. Hoover, E. M. 1937. *Location Theory and the Shoe Leather Industr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9. Kaarel K. 2006. Public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and Delocalization of Estonian Labor Intensive Industries. The 62nd International Atlantic Economic Conference.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5 – 8 October.
10. Kilvits, K. , Purju, A. 2006. Delocalization of labor intensive industries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with evidences from Estonia. – *Business Interaction in Local Economies*. Edited by Maciej Kozkowski and Andzej Kacprzyk. Volume 2. COPE International, pp. 299 – 320.
11. Lois L. , Christos K. 2004. The delocalization of production in labour intensive industries; instances of triangular manufacturing between Germany, Greece and FY-ROM.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Volume [http: //www. informaworld. com/smpp/ti-](http://www.informaworld.com/smpp/title~db=all~content=t713417253~tab=issueslist~branches=12~v1212)
tle ~ db = all ~ content = t713417253 ~ tab = issueslist ~ branches = 12 – v1212, Issue 8

December, pages 1157 – 1173.

12. Markusen, A. 1996. Sticky places in slippery space: a typology of industrial districts. *Economic Geography*, 72 (3): pp. 293 – 313.

13. Marshall A 1890. *The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第一版.

14. Massimiliano M. et. al. 2009. Outsourcing, Delocalization and Firm Organization: Transaction Costs vs.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a Local Production System of Emilia Romagna. presented at in the 16th National Scientific Conference of AISSEC (Parma (Italy)).

15. Momtagnana S. 2005. Delocal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imisoara a cluster?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Footwear Indust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icro and Macro Dynamic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Seminar, Varese.

16. Pickles, J. and Smith, A. 2011. Delocalization and Persistence in the European Clothing Industry: the Recofiguration of Trade and Production Networks, *Regional Studies*, 45, pp. 167 – 185.

17. Porter, M. 1998. Clusters and the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November/December.

18. Schamp E. W. and Main F. 2005. Decline of the district, renewal of firms: the case of footwear production in a German Border Area, paper presented in the workshop. The Restructuring of Old Industrial Areas in Europe and Asia,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Bonn, Germany.

19. Scott, A. J. and M Storper. 2003. Regions, 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Regional Studies* 37: pp. 579 – 593.

20. Storper, M. and Venables, A. J. 2002: Buzz: The Economic Force of the Ci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torper M 1989: The transition to flexible specialization in industry: External economies,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crossing of industrial divid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3: pp. 273 – 305.

21. UNIDO, 2003: International Subcontracting versus Delocalization? A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and Case – studies from the SPX Network, UNIDO Report, UNIDO, Geneva.

22. Wei, D. Y. – H. , Li, W. , Wang, C. 2007. Restructuring industrial dis-

• 12 •

tricts, scaling up regional development: a study of the Wenzhou model, China, Economic Geography, 83: pp. 421 - 444.

23. Wang, Jici. 2007. Industrial clusters in China: the low road vs. the high road in cluster development, Chapter 7 in Allen Scott and Gioacchino Garofoli (ed.): Development on the Ground: Clusters, networks and Regions in Emerging Economies, Routledge pp. 145 - 164.

24. Wang J. C. , Wang J. X. (1998): 'An analysis of New - tech Agglomeration in Beijing: A New Industrial District In the Making?'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pp. 681 - 701.

25. 魏心镇, 王缉慈. 新的产业空间——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与布局.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26. 王缉慈. 现代工业地理学.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4.

27. 王缉慈, 林涛. 我国外向型制造业集群发展和研究的新视角. 北京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7, 43 (6): 839 - 846.

28. 王缉慈等. 超越集群——中国产业集群的理论探索. 科学出版社, 2010.

29. 王缉慈等. 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30. 王缉慈. 让低端产业集群“飞”. 北大商业评论, 2011 (4).